

观察

第一辑

THE OBSERVER 发展与均衡



主编◎杨其川 王 强

吴敬琏

创新驱动未来经济

茅于軾

收入差距与社会垂直流动性

温铁军

当代中国的三农新解

周其仁

城市化进程与经济转型

李鸿阶

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反思

刘世锦

中国“挤压式”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增长模式转型

李稻葵

经济结构失衡的表象与深层原因

许小年

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转型

华 生

双轨制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

夏 斌

中国经济转型只争朝夕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1-125 27
2013/1

观察

第一辑

THE OBSERVER

发展与均衡



主编◎杨其川 王 强

吴敬琏

创新驱动未来经济

茅于軾

收入差距与社会垂直接流动性

温铁军

当代中国的三农新解

周其仁

城市化进程与经济转型

李鸿阶

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反思

刘世锦

中国“挤压式”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增长模式转型

李稻葵

经济结构失衡的表象与深层原因

许小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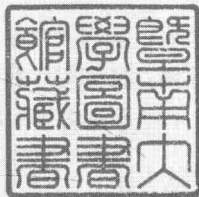
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转型

华 生

双轨制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

夏 斌

中国经济转型只争朝夕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观察. 1, 发展与均衡/杨其川, 王强主编. —北京:
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80234-850-9

I. ①观… II. ①杨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国经济-经
济管理-文集 IV. ①F12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4275号

书 名: 观察: 发展与均衡

主 编: 杨其川 王 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234-850-9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元

联系电话: (010) 68990535 6899069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 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子邮件: 10561295@qq.com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探寻铸造幸福的发展与变革

杨其川

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，世界各国的财富，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被创造和集聚。中国尤然，由于推行改革开放，市场要素被激活，释放出了强大动力，使经济增速突飞猛进，持续领跑全球。这种领跑地位在目前各国经济普遍低迷时更显突出。就经济总量排名而言，两年前即从30多年前的全球排名第13位，跃居全球第二，超过日本，仅次于美国。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之快，即便是世界顶级经济学家，也不免深感惊愕，叹为奇迹。

但是，伴随着中国在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、全球化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同时，城乡分隔、贫富悬殊、地区差距，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、资源代价、文化代价及社会代价等问题，却已使整个社会面临断裂的危险。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显示，截止到2011年，中国大陆人均收入更是从1976年的全球排名第69位，被甩到了第133位。

从全球范围看，以上“五化”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，并未给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普遍的公平和福祉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、发达国家之间、发展中国家之间三大不平衡继续存在和深化，同时，经济全球化又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。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，是世界发展不平衡矛盾的一个最新集中表现。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，目前还深陷危机之中，尤其是欧洲，欧债危机使得这片老牌的资本主义大陆难以看到曙光。

毋庸讳言，我们所处的世界，一面是物质充裕、一派繁荣；一面是贫富不均、沉疴遍地。

美国已故著名欧洲史学家、思想研究专家托尼·朱特认为，导致世界如此现状的总根源在于：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性谬误，错把物质追求的自我利益变成一种美德，并成为唯一集体意识，甚至已臻顶礼膜

拜之境地。用我国著名学者温铁军的话来说就是：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成了纯粹的“经济动物”，除了物欲，再没有别的东西。

于是，有良知的人们开始反思，反思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，不少人还着手探寻“另一条路的可能”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更是一再呼吁：“中国必须转型”，并明确指出，“转型的关键在推进全面改革”。

是的，世界需要反思，需要变革。发展失衡、矛盾开始凸显的中国，更是亟待变革与转型。

伴随着上述“五化”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，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、制度环境与治理环境，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对中国而言，这种不断深化的变化和既有的发展模式之间，发生了日趋激烈的冲突和矛盾，诸多困难和挑战就在眼前：包括领土争端，欧债危机导致外需减缓，国内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等要素成本上升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，经济结构的再平衡，以及全面改革压力增大等等。

我们认为，亟待变革与转型的中国固然要把“探寻能够铸造幸福的发展与变革”作为基本任务，但首先要实现发展的“均衡”。我们强调的“均衡”，绝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平均主义”，而是在追求经济增长与繁荣中，要兼顾生态平衡、社会公平、文化完整、信仰重建等。

面对困难与挑战，我们需要勇气和自信。正是基于这一认知，《观察》系列将与读者见面了。我们将秉承“共铸幸福”的理念，第一辑即以“发展与均衡”为主题，收录了近20名知名学者的文章。我们坚守独立、客观、前沿、多元、理性、建设性的基本原则，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中遇到的焦点或者难点问题，邀请国内外专家、官员、企业家与一线行动者等从其专业与实践出发，给出独立客观的评论、有建设性的方案设计与政策建议，以期扩散智识，寻找共识，唤起更多元、更立体、更符合事实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行动，以增进社会的和谐。

简

[作者介]

福建东南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，研究兴趣为：制度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、区域经济学、城市战略定位及其营销、新商业计划及战略的制定、新的商业模式转型、业务成长及运营改进等。

经济转型篇

城市化进程与经济转型

002

周其仁 ▶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。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：新制度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、劳动经济学、中国经济等。



中国“挤压式增长”后的速度回落与增长模式转型

012

刘世锦 ▶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。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、产业发展、经济制度变迁等。





024

吴敬琏 ▶

创新驱动未来经济

著名经济学家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曾获首届“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”，连续五次获得中国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。



030

李稻葵 ▶

经济结构失衡的表象与深层原因

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，博士生导师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主要研究中国经济运行、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以及大国发展战略等。



036

许小年 ▶

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转型

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，曾任职世界银行顾问，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——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。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、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、中国经济改革等。



040

蔡立雄 ▶

经济增长模式、企业技术战略与教育选择

龙岩学院副教授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博士后。

城市 化 篇

收入差距与社会垂流动性

054

茅于軾 ▶

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，代表作有《择优分配原理》、《中国人的道德前景》等。



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反思

058

李鸿阶 ▶

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，福建省政府顾问，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主要研究世界经济、投资研究、华侨华人历史等。



中国城市化的歧路与正途

067

童大煊 ▶

资深时评人，城市化、房地产和宏观经济研究前沿专家，荣获2006、2008年度“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”之一，2011年度《南方周末》“中国传媒年度致敬作者”。



中国经济转型只争朝夕

081

夏 斌 ▶

国务院参事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专家。



农村 发展 篇

088



王松良 ▶

福建“三农”问题新动态及出路探究

——兼论社区大学引导下的乡村发展模式选择

福建农林大学教授，农学博士，海外副院长，中国农学会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分会委员。研究方向为农业生态学、农业生物技术等。曾2次获得教育部公派赴荷兰和加拿大留学。

103



温铁军 ▶

当代中国的三农新解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、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，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，著名三农问题专家。

112



邱建生 ▶

城乡共生与 在地化教育系统的初步探讨

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干事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。

关注农村空心化

118

辛秋水▶

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主任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学术顾问，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、安徽省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。



举社区之力

130

邱建生▶

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，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。



理论 思辨 篇



136

周立 ▶

进步的迷信与发展的终结

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，研究领域：中国国情分析、现代化进程、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、世界经济与政治等。



150

华生 ▶

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

经济学博士，著名经济学家。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，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（价格双轨制、国资体制、股权分置改革）的主要提出者和积极推动者。



154

温铁军 ▶

贫困经济学：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、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，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，著名三农问题专家。



163

郭少英 ▶

有一片恐怖的绿洲

《澳门商报》首席记者，资深财经媒体人。



观察 发展与均衡
OBSERVER

经济转型篇

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家敲响了一记警钟：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需求，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，势必影响到中国企业长远发展。

无论是开发国内大市场的潜力也罢，还是在做国际化的品牌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也罢，创新问题再次被摆到了企业家们的桌面上来。如何创新？如何鼓励创新？如何保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？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在经济转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，包括制度上的设计安排。



周其仁

城市化进程与经济转型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。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：新制度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、劳动经济学、中国经济等。

传统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

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不高，是不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空间表现呢？农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，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晒得到太阳，才有产出。这就决定了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积——“有土斯有财”。在广袤的土地上搞农业，人口唯有分散居住，才便于就近照料庄稼。倘若不是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要，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是极其发散的。

不过，早有学者指出，中国山多地少、各地差异极大的生态经济环境，并不注定这个伟大的文明非要以农立国不可。事实上，商业文明早就在中国萌芽，而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空间上聚集的要求。我们不妨从最初级的市场“集市”开始，买家和卖家总是自然地聚到一起，仿佛非要熙熙攘攘地凑热闹，才便于交易的达成。问题是，仅仅为农业服务的集市，受制于交通条件，覆盖的人口范围不可能过大，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。关于这一点，人类学家施坚雅（G.W.Skinner 1925~2008年）做过出色的研究。这位早在1949~1950年就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美国教授，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村庄组织起来的。在庞大的市场网络的最基层，往往是一个集市带动着周围15~20个村庄。

从集市“向上”发展，就会到达层级各不相同的“中心市场”。原来，交易活动也分层，并像产业活动一样会逐步升级！现在不难明白，这只不过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、交易半径的延伸以及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，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本——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——参与其中，当

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备的保护。于是，高端中心市场多半设在有城郭拱卫之处，依城建市，“城市”应运而生。

当然，“城”还有其独立的来历。对版图辽阔的中国而言，庞大的军事行政网络必定有空间上的表现。至少秦汉以降，“百代都行郡县制”——皇帝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，布关设防、征收税赋、实施政令，当然要选地理网络的中心节点充当各级衙门的所在地，否则无从应付大一统帝国极其昂贵的治理成本。官、兵、民的聚集之地，商业服务供需两旺，因城而“市”的，所在多有。其中，最耀眼的当数历代京师之地，像咸阳、长安（如今的西安）、杭州、北京，每一个都是最繁华大都会的一时之选。

这样，以市立城也罢，以城立市也罢，殊途并进，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。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？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：“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，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，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。”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，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，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。

可惜，城市体系作为复杂商业的空间构造，说精巧极精巧，说脆弱又非常脆弱。譬如战乱对城市的摧残，总是甚于对乡村的破坏。很不幸，中国历史上外患内乱频仍，战争动乱的规模之大、持续时间之长、杀戮之残酷，历史上的欧洲怕是没得好比的。历史似乎不讲对称，生产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，破坏力以城市为目标却“很自然”。仅就此点而论，中国的城市文明即使达到过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度，也一定屡遭毁灭性的破坏。

和平时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，则是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。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，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？有解释说，那是商业利润太高，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。就是说，担心“无商不富”摇动了“无农不稳”。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“道理”——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，唯有“兴商”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，而“抑商”反倒会永远维系商业暴利。历代圣贤与明君，怎么会连这个简单道理都不懂？后来看了1940年末吴晗和其他多个专家的著述，才领悟到中央皇权真正担心的是富商与之争夺官僚的忠诚。农业大国

的财政基础薄弱，高薪养廉很好说，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。低薪不养廉，官僚们公权私用的成本很低，一旦富商用钱买走他们的忠诚，即便“贵为天子”，还有什么意思吗？这样看，“抑商”所固的远不只是“农本”，而是大一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国本。

代价就是城市抑制。因为讲到底，抑商即抑城。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，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（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），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，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。可是，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，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，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。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，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，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？

加到一起，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、抑商政策倾向以及频繁的战乱，一起抑制了现代化中国的城市成长。据史家估计，1843年在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，约有7.4%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镇，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地区的4.2%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；但1801年的英国，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就达27.5%。这说明，早在工业革命之前，城市抑制就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距离。

1840年以后的中国，主权动摇、被迫开放。以上海为代表的“五口通商”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，却又被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战乱所抵消。正负影响算到一起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，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区区的10%。

现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

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。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，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，不需要每部机器、每道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，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，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。此外，工业产能大幅度提高之后，产出有了革命性的增长，需要更发达的分配体系，一般也会刺激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。

我国在很长的时期内，推进工业化的难度很大，因为长期以农立国，工业化的资本、技术、人才门槛太高，难以逾越。比较之下，“城市”却是老早就有了的。发展城市也没有什么名堂，似乎工业化之后，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。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，“消费性的城市”再多，对经济也没有好处。由此，前辈学者皆重工业化。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，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。比照之下，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，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。

衡量工业化的水平，关键指标是“工业化率”，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。城市化呢？当然是“城市化率”，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。这两个“率”，一个经济，一个人口，当然无从直接比较。不过，由于工业活动总要“投影”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，所以在经验上，以上两“率”又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。

根据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，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.3%，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？46.8%。这就是说，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，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。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不过就全球的情况来看，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，还是偏高了。用世界银行的数据，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.9%，而工业化率不过26.1%，而中国的两“率”的比值是1.09（即城市化率/工业化率为51.3%/46.8%）。全球的平均比值是多少呢？1.95（50.9%/26.1%）。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，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就不重要了，从大的数据比例来看，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，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。

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了。2010年，美国的城市化率/工业化率为4.1，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.1倍。同年同一比值，法国为4.11，英国为4.09，德国为2.64，日本为2.48，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。即便是“金砖五国”中的巴西、俄罗斯、南非和印度，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.22、1.97、1.38和1.15，都比中国的高。不可小看这个比值。工业化活动引起人口分布的改变，在空间上总有相应的表现。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，描绘的是随着工业产出占总产出比